

俄羅斯漢學家瓦西里耶夫院士的生涯及其著作

Academician Vasiliev's Studies on Sinology and Recent Republications of His Works

葉可佳 (Ekaterina Zavidovskaya) *

瓦西里·帕夫羅偉奇·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漢文名: 王西里, 1818-1900) 是俄羅斯漢學奠基人之一。他和比丘林¹ (Бичурин Н. Я., 1777-1853)、卡法羅夫² (Кафаров П. И., 1818-1878) 被稱為 19 世紀俄羅斯漢學的泰斗。1878-1893 年王西里擔任聖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的主任, 1866 年被選為俄羅斯帝國科學院通訊院士, 1886 年成為科學院院士。一般稱他「偉大的佛學專家」, 但他的研究範圍遠超過佛教。他對中國和遠東國家的語言學、文學、歷史、地理、思想史、考古學、植物學、製圖學、錢幣學等領域, 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19 世紀各國和各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和隔閡。俄羅斯漢學家和他們所接觸的中國人, 其原本的文化各自根深蒂固。因此, 俄羅斯人 (或他國的西方人) 對這些文化差異很敏感, 他們的著作和對中國的評價就是那個時代中西來往的重要體現。作為東正教駐華使團的成員, 王西里代表了那個年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科學和啟蒙精神。中國與俄羅斯的外交和貿易往來的性質跟中西關係來比, 差異頗多, 而俄羅斯人與西方人 (主要是指傳教士) 在華的經驗也很不同。因而, 本篇探討俄羅斯漢學先河的中國研究成就, 應能擴大當代人的視野,

增加對那個時代跨文化交流的了解。19 世紀是西方漢學研究的高峰, 而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成就被當時西方學術界所承認, 至今仍未失去學術價值。本文寫作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王西里的主要學術成就和其近年來再版的著作。

一、喀山大學的第一位蒙古語文學碩士

王西里少年和念書時代相關的資料, 主要來自斯卡奇科夫的名作《俄羅斯漢學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под. ред. Мясникова, Москва 米亞斯尼科夫編, 莫斯科, 1977)。³ 但俄羅斯漢學史專家霍赫羅夫 (Хохлов А. Н.) 的一篇〈瓦西里耶夫於下諾夫哥羅德和喀山〉(В. П. 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 1974)⁴ 在很多方面補充了斯卡奇科夫著作的不足。王西里於 1818 年 2 月 22 日出生於諾夫哥羅德市的小官員家庭。雙親來自神父家庭, 父親在下諾夫哥羅德從抄寫員升職到九級文官, 母親的老家在巴拉赫那鎮。家有五個兄弟姐妹, 他排名第五。七歲開始在縣城學校讀書, 九歲獲得小學的優等畢業

* 作者為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1 閻國棟, 〈比丘林與俄國漢學〉, 《漢學研究通訊》20:3 (2001.8): 70-80。

2 陳開科, 〈19 世紀俄國漢學大師巴拉第的生平及學術〉, 《漢學研究通訊》25:3 (2006.8): 27-35。

3 本篇引用斯卡奇科夫著的《俄羅斯漢學史》時, 先提到俄文原本的頁碼, 而後面提到中文譯本的頁碼: 斯卡奇科夫著, 柳若梅譯, 《俄羅斯漢學史》(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4 «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 изд - во « Наука », М., 1974 г., с. 28-70.

證。1828年他考上下諾夫哥羅德高中的二年級，十四歲（1832）獲得的畢業證書，顯示出這位畢業生在古斯拉夫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方面的優秀成績。王西里的父親於1832年過世，當時他的年齡還未滿十六歲，無法報考大學。1834年他被醫學院錄取，但該系是全自費的，因而王西里申請調到歷史語文學院，通過不少努力，才獲得東方語文分部公費生的身分。在蒙古語文教研室主任科瓦列夫斯基教授⁵（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М.）的指導下，王西里開始學蒙古文和韃靼文。

王西里的順利學習還歸功於喀山學區督學長穆辛·普希金⁶（Мусин - Пушкин М.Н.），他注意到王西里的才能，並將他和另一位學生拿夫羅茨基（Н. Навроцкий）安排住宿在喀山第一高中，跟著一位名叫剛措爾·加爾桑·尼基圖耶夫（Гэцүл Галсан Никитуев）的喇嘛學蒙文。這位喇嘛來自後貝加爾區的布里亞特，是伴隨著四位到喀山大學學習的布里亞特學生而來。經過四年的練習，王西里的蒙文口語很流利。1837年他撰寫的畢業論文分析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中的一篇經文。1838年底他考上了碩士班，在科瓦列夫斯基教授指導下開始研究佛教，他很快通過了題目為《論佛教思想基礎》（Об основаниях будди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Дух Алтай гэрэл'а）的碩士論文答辯，並獲得蒙古語文學碩士學位，一段時間後，又獲得韃靼語文學碩士。

1838年科瓦列夫斯基教授推薦自己的學生擔任第十二屆東正教使團的團員，在推薦信中他如此描述學生的能力：「他很流利將蒙文文章翻譯成俄文，口語翻譯

的基礎允許他進一步的深造……」。此外，他努力地學藏文，目前是他的主要任務。我認為，除了藏文外，要讓他開始學梵文。」⁷1837年喀山大學創辦了漢文教研室，主任是西偉羅夫大司祭（Сивиллов Д. П., 1788-1871），1820-1831年擔任過第十屆東正教使團的成員。加入第十二屆佈道團前，王西里曾上過西偉羅夫的中文課。另外，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北方（藏傳）佛教，他甚至被派遣到霍舍烏托夫烏蘆斯⁸（Хошеутовский улус）調查佛教。

雖然已獲得碩士學位，王西里在使團只具備學生身分。根據當時的規定，使團的每位成員要遵守和執行很詳細的指令和工作任務。蒙文老師給王西里的研究指示包括如下的任務：為了達到學會藏文的目標，科瓦列夫斯基建議王西里首先熟悉藏文文獻，然後把所發現的詞彙列入藏俄詞典。接下來必須把握西藏的歷史、文學和對藏族帶來影響的周邊民族的歷史。他特別強調，與藏族歷史有關的中文編年史還沒被研究完。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王西里要多關注歷史地理方面的資料，考究地名來源。另外兩個領域是，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歷史和靠近中國邊界的中亞民族歷史。搜書方面的主要任務是《甘珠爾》和《丹珠爾》⁹兩部巨作的採購及其研究，各種中文書目的採購，並準備編出一套《本朝漢滿文書目》。王西里必須在日記裏記載中國首都所發生的事件和政府命令，多參考《京報》。喀山大學委托他在中國考察採購各種種子、礦物、植物、昆蟲和動物標本、農業工具、工藝品等作為學校博物館的陳列品。俄羅斯科學院還讓

5 科瓦列夫斯基（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М., 1800-1878），波蘭籍的佛學和蒙古學專家，蒙古學術研究的開闢者，1828-1833年參加前往後貝加爾和蒙古的考察團，1830-1831年在北京居住了七個月。1832年1月他在特洛伊茨克薩弗克鎮（Троицкосавск 恰克圖）參加創辦布里亞特班長子弟的學校，1835年該校派遣最優秀四位學生到喀山高中學習，伴隨他們的人就是未來王西里的蒙古語老師。科瓦列夫斯基1847年被選為院士，1855-1860年間任喀山大學校長。

6 穆辛·普希金（Мусин - Пушкин М.Н., 1795-1862），俄羅斯軍事、社會活動家，1829-1845年間任喀山學區的督學長，在他的特別關注和協助下，喀山大學開辦蒙、漢、滿、梵、亞美尼亞、阿拉伯、波斯、突厥語文的教學和研究。喀山第一高中也開辦東方語文課。

7 Хохлов А. Н.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 Стр. 36.

8 沙俄時代位於阿斯特拉罕省和卡爾梅客族遊牧區的烏蘆斯（沙俄時東部和北部邊遠地區的行政區劃單位），主要人口是卡爾梅客人，他們的信仰是藏傳佛教。

9 《甘珠爾》是藏文大藏經的一部分，佛陀所說教法之總集，甘珠爾的意思是教敕譯典，《丹珠爾》是論述譯典，內其容包含諸論師之教語、註釋書、密教儀軌等。

王西里當亞洲司的通訊員，委托他在中國採購本司所缺的蒙、藏文書籍。

二、東正教駐京使團成員的「北京日記」

1840年1月5日王西里跟著使團成員前往中國，他們經過伊爾庫斯克、恰克圖、蒙古，10月底到達北京。王西里一路教他的同事蒙文和藏文。使團成員在恰克圖外語學校還上了克里穆斯基老師¹⁰（Крымский К. Г.）的滿文和中文課。

據喀山大學的要求，王西里達北京後必須每天寫日記。他的「北京日記」保存在檔案館。¹¹從中國回來後，王西里把一部分日記整理成〈北京日記摘錄〉（Выписки из дневника, веденного в Пекине），在《俄羅斯通報者》（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57，第9冊，10號，頁145-200，№12號，頁475-497）發表。在「北京日記」可讀到王西里剛到北京的前三年沒有蒙、藏文老師。原本給王氏安排了享有名譽的一名喇嘛當藏文老師，他的薪水來自俄羅斯外交部，但很快便發現他的藏文水平比王西里還低，因此被免職，一年後才找到了合適的老師，是一位蒙古喇嘛。¹²由於王氏精通蒙語，他很快便掌握了書面的滿語。1850年回國後他在報告裏很準確地描述了滿語在北京的情況：

目前這門語言可視為死語言……，我參考了滿語的儒家經典，《通鑒綱目》，一部分法典，自漢語翻譯過來的小說。我認為，連精通滿文的專家很困難看懂滿文寫的佛經，除非他們看過他語言寫的佛教書籍。¹³

「北京日記」顯示，王西里在北京遇到的腐敗的、停滯的環境很不利於他的學習和研究，但他盡量克服這些困難，而其研究成果令人敬佩。從北京回國後他向喀山大學領導匯報了自己工作的成果，其中就有：《藏語語法基本原理》（Основания тибет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藏語文選》（Тибет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印度佛教史》（История буддизма в Индии），《西藏、中國和蒙古佛教史》（История буддизма в Тибете, Китае, Монголии），《西藏地理》（География Тибета, Миньцун(?) 呼圖克圖¹⁴西藏地理著作的譯文，譯自藏語），譯自漢語的《西域記》（Сиюй цзи），譯自清代官員吳振臣的《寧古塔紀略》（Записки о Ниингуте），中國歷史地圖，《佛教文獻》（Будд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譯自漢語）。¹⁵

王氏《北京日記摘錄》包括1848-1849年（道光二十八、二十九年）的記錄，如1848年2月27日寫到：

庫倫（俄文稱「烏爾嘎」Урга）呼圖克圖從西藏搬到蒙古的事件，最近從蒙古往西藏（免經中國）的路線變得不安全，藏族盜賊經常搶劫駝運隊。去年底（1847）從拉薩往西寧的駝運隊被搶，貨物中甚有班禪喇嘛給皇帝的貢品，還有我（指王西里）曾訂的書籍。雖然幾千個漠北蒙古信徒來迎接他，呼圖克圖不敢用這條路線，他請清政府允許他通過四川過去，但遭到拒絕。

這條記錄顯示，當時的清政府無法完全控制接壤藏區的土地。1847年8月12日的記錄寫到：

漠北蒙古人前往西藏迎接庫倫（俄文也稱Куруень）呼圖克圖，而途中在青海湖（用俄文稱Ху-хэнор）

10 克里穆斯基（Крымский К. Г.，1796-1861），1820-1931年駐京佈道團成員，1832-1861被外交部派遣到恰克圖外語學校教中文。

11 Архив АН СССР, ф.775, оп.1, ед.хр. 38/2 «Пекин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ед.хр. 13, 共十本，無頁碼。蘇聯時代某人做王西里日記手稿的列印文本，但其中有不少錯別字，存於蘇聯科學院檔案館（ф.775, оп.1, ед.хр. 212）。

12 Хохлов А. Н.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 стр. 45.

13 同上，стр. 46。

14 呼圖克圖（Hotogtu）：清朝及中華民國初年對一部分高級藏傳佛教轉世喇嘛所封的職銜。呼圖克圖的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

15 Скачков П. 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206, 斯卡奇科夫 2011: 295.

被搶劫兩次。清政府派遣某官Ле - бинь伴隨呼圖克圖，他把這樁搶劫案向皇上報告。毫無疑問，盜賊屬於倔強的西藏氏族，他們盤踞在四川、甘肅和更西邊的地區，被稱為ГОЛОКИ，他們甚至走到拉達克（俄文稱Ладак）。中國人認為，漢北蒙古人很勇敢，但連這些虔誠的戰士被搶劫幾次。

11月14日的記錄：

剛到庫倫的少年呼圖克圖去世了，我聽說過，找到一個呼畢勒罕（已接受轉世認證，但是尚未成年的祖古），組織在西藏迎接他（共五千個人），為西藏寺院做布施，給達賴喇嘛、班禪供品，在這些事情上蒙古人總共花了二百萬銀兩，呼圖克圖一去世這些都白費。中國商人敬佩鍍金的標本，給它帶來供品，將他稱為「活佛」，這個消息令我很驚訝。其實可理解，呼圖克圖住在庫倫時，那邊的生意變得很旺盛，我親自看過，庫倫的買賣城不比恰克圖的差。沒人願意為了買一塊俄羅斯布，而走幾千里的路，他寧可在自己包裹等個小販，跟他換一頭羊或馬。那麼，活佛對地方經濟有影響，為什麼政治經濟學家不注意這一點呢？

8月12日的另一條新聞：

據甘肅總督的報告，「新疆」（王西里用俄文直接寫成новая линия，就是「新疆」的意思）一直保存可觀的管款：在伊犁三十萬銀兩，在烏魯木齊二十萬，在莎車縣城二十萬，在阿克蘇十萬，共八十萬銀兩。假如我們能夠把這些管款全部攫取，這些經費會協助我們與中國打仗。從本篇報告還可做出結論，如中國拒絕與俄羅斯做貿易，而導致戰役的爆發，那麼，中國對此已做好準備了。

王西里的日記呈現他對新疆的特別注意，當時沙俄與清政府的關係因為這個地區惡化。

11月15日的記錄是對大清邊緣地區發展的評價，其中寫到：

我們對長城以北國家的了解是過時的，我們將其看為野蠻的、荒無人煙的遊牧民族區，但除了漢

北蒙古、察哈爾和、素尼特（俄文稱СУНИТЫ）居住的地區外，其他地方早有人種田……其中的漢北蒙古排斥中國人和農業，認為兩者會顛覆他們的民族特色，而令漢北蒙古人永遠成為中國人的奴隸……我們（指俄羅斯）在北方阻止了遊牧生活方式，讓當地人民定居而種田，我們手裏的人力大少於中國，比中國的經費也少得多……好像整個人類和中國人不太理解我們統治西伯利亞給世界帶來的好處。否則漢族和蒙族的農民很難在這裏紮根……準噶爾和漢北蒙古人就不會成為滿族人的屬下，因他們會往北退，而滿族人也不敢追他們那麼遠。結果，這些遊牧人會侵占較弱的烏蘆斯，而加強起來，並開始搶劫和報復中國的統治者。這件事沒發生歸功於幾千個如鐵鏈的俄羅斯士兵從阿穆爾河（Амур）綿延到鄂木斯克市（Омск），而遊牧人不敢打斷這條鐵鏈。

接下王西里提到，在蒙古種的糧食蒙古人自己買來吃；另外，很多漢族工匠住在那邊的城市，他們也吃本地糧食。西蒙古的多餘糧食跨越長城到華北販賣，東蒙古的糧食則集中在黃海岸上的錦州。雖然貨船禁止在這裏靠岸，但錦州還是蒙古人和滿族人的主要集市，糧食從這裏大量運到中國南方。很難拿到針對中國人的貿易準確統計數字，只能私下獲得資料，官方數字只反映一小部分的貿易，大部分的稅收流入私人口袋。從某御史的報告可了解黃海港口往南運輸的糧食量：從位於如遼河口附近的鎮城，每年運輸三到四百萬袋滿洲糧食，那麼，一個小鎮的吐納量超過敖德薩（Одесса）、里加（Рига）甚至聖彼得堡的港口。重點是，政府並很不鼓勵漢族人在滿洲發展農業，這產量是最近才達到的，百年前的此時，只有幾十袋糧食從這個小地方被運送，而本世紀的20年代也只有幾萬袋而已。

在《俄羅斯通報者》發表的〈北京日記摘錄〉其他片段，主要顯示王西里對清政府財務政策、貿易發展、稅務負擔、官位買賣的分析。1870-80年代王西里在俄羅斯的期刊和報紙發表了幾十篇評論當時中國局勢的文章，1900年這一系列文章匯編成《發現中國：回憶北京；俄中條約；回教在中國；中國的進步》論集（Васильев В.П.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екине.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трактаты. Магометанство в

Китае.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Спб., 1900)。

三、東方書籍的搜集及書目整理

在北京擔任東正教使團成員時，王西里採購了幾百本書籍。在喀山大學任教時，他開始編寫喀山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漢、滿、藏文書目，大部分（827本）是王西里在北京購買的。王西里1850年12月從中國回到喀山，1851年1月被任命為漢滿文編制以外的教授。為了參考聖彼得堡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圖書館收藏的東方書籍，1854年冬他出差到聖彼得堡。王西里在1880年出版《中國文學史綱要》前，俄羅斯和西方只有各圖書館的東方書目，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在他的著作《中國文學筆記》給予亞洲博物館東方書籍圖書館很高的評價。

東方學系1855年搬到聖彼得堡大學後，一些具有相當價值的書籍也搬到聖彼得堡。王西里1857年在《俄羅斯通報者》（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發表的〈聖彼得堡大學收藏的東方書的信笈〉¹⁶（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一文可看作是其名著《中國文學史綱要》（1880）的前言。在這篇論文中，王西里強調俄羅斯圖書館獲得整套《丹珠爾》的重要性，這套書共250冊，每冊二十磅重，一份藏於聖彼得堡大學圖書館。據他的回憶，他在雍和宮見過《丹珠爾》和《甘珠爾》兩套經文的蒙、滿語版，但這些都買不著（頁308）。為了採購藏文書，王西里認識了很多北京喇嘛和來往西藏的商人，才獲得不少在拉薩刻的書。蒙古書商在北京大量採購藏文經文後，以

三倍的高價在蒙古販賣，而布里亞特人則出更高的價錢。王西里認為，通過他的努力，聖彼得堡大學圖書館得以擁有最豐富的藏文藏書。

滿語官文方面，聖彼得堡大學圖書館收藏了很完整的一套清朝法典、聖詔、《大清律例》、《大清會典》。據王西里所言，聖彼得堡大學還收藏一套很珍貴的滿文手寫本，是阿莫爾軍政長官的管轄區（Амур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從它設立到1810年所有事物的記錄本，內容包含中俄來往的重要相關資料。

喀山大學中文書的收藏從西偉羅夫大司祭贈送給學校的四千本開始，這批書籍主要包含經典、哲學思想和基督教有關的書，這些書籍原來屬於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當他們被禁止所有活動後，在離開中國前，就把珍貴的書籍送給俄羅斯的傳教士。¹⁷王西里從儒家經典說起中文書籍，聖大圖書館的這類書籍收藏很豐富，如《欽定七經》（1721-1748），總督阮元於1764-1849年編的《皇清經解》、《性理精義》等。道教文獻的數量也不輸給佛教，王西里在北京時，沒能買到康熙年間出版的《道藏》，只採購了南方刻的《道藏輯要》。

1855年開始擔任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的教授後，王西里致力於開創各種漢學課程及教學工作，其中大部分課程，如漢、滿語言文學、中國歷史、地理等，都由他親自教授。2012年筆者和馬懿德老師編輯王西里當教材用的中滿文書目，顯示王氏在教學方面的工作。¹⁸東方系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共有2,045種，其中的207種列入「王西里教學書籍」書目。列入本目錄的書籍均帶有“ВУ”標誌，是指《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учебный》或《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ученический》（「王西里教學書

16 Васильев В.П. 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57, т.11, № 7, с. 305-343.

17 斯卡奇科夫著提到，1838年的葡萄牙傳教士畢學源（Gactano Pereira Pirés 1763 -1838）在北京去世後，按他的遺書，將他收藏的大批書籍送給俄羅斯使團（第十一屆東正使團），這批書共3345種，其中一小部分較為生僻的天文學書籍，則被運到聖彼得堡。剩下的書1860年由俄國特使伊格納季耶夫（Игнатъев Н.）轉給了法國的傳教士（Скачков 1977:149，斯卡奇科夫 2011：210）。

18 葉可嘉、馬懿德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國書籍目錄》（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2012；Описание собр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академика В.П.Васильева в фонд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Нау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 в СПбГУ, 2012）。可參考在線版：<http://www.ci.spbu.ru/vasiliev/index.html>。

籍」)。索書號自BY 1 至BY 270，其中有 63 種沒保存，所以圖書序列號有空缺，一部分副本具有單獨的索書號，一部分副本沒有單獨索書號。編者認為，大多數「王西里教學」書籍的封面上用鉛筆加寫的“BY”標誌是 1934 年圖書館進行清點工作時完成的，這批藏書的後十幾本有歐式皮套，其側面上用沖壓方式寫著“BY”標誌，也許這一批才屬於原來的「王西里教學書籍」。中國天津師範大學的李逸津教授在本書目的書評中列出有價值的書，如儒家經典中的《御纂周易折中》(BY 1)、《欽定書經傳彙纂》(BY 3)、《欽定詩經傳彙纂》(BY 4)，皆 18 世紀初寶貴的官方刻板。李教授如此評價書目裏的佛教書：

許多是印刷精良的御製版本……不少是西元 15-17 世紀明代的刻本。其中《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BY177) 係藏經經典，刊有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五年(1417 年) 四月十七日所作序文，現在中國大連圖書館藏有同一版本，是十分珍貴的藏經古本。¹⁹

在禁書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載花船續編》(BY 164)：

目前存世的在中國國內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原北京大學教授馬廉私藏的 8 回本，此外還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庫的倉石藏本和英國藏抄本。²⁰

瓦西里耶夫院士捐贈給東方系圖書館的個人私藏中國書籍就有 600 餘冊，但「教學書籍」之外的書籍已散失在其他老中國書中，在期待專家的整理。

四、對於儒釋道研究的貢獻

王西里在念碩士時便開始關注研究佛教，也有

機會接觸到《甘珠爾》。他在使團的主要任務為佛教歷史和文獻研究。雖然十二屆佈道團首腦圖卡列諾夫(Тугаринов Поликарп, 1799-?) 指導和監督其他成員的佛學研究，王西里堅持按自己的研究計劃挖掘佛教文獻。居住在北京時，瓦西里耶夫如何接觸到《甘珠爾》和《丹珠爾》？據霍赫羅夫所說，擔任第十屆使團成員時，圖卡列諾夫於 1833 年採購了這兩套經文的漢語譯文版，由於無法將這套書帶回俄羅斯，就把它賣給使團圖書館。他給領導匯報這個情況時，強調這兩套經文在中國很稀罕，因而其中文版也很有利於佛教研究。²¹ 據王西里的日記，他在 1840 年代親眼看到「藏於紅城北區花園中的一棟大樓裏」的武英殿藏文《甘珠爾》刻版。藏、蒙文刻板於 1900 年被八國聯軍當作木柴燒掉。只有很富裕的寺院才買得起整套《甘珠爾》和《丹珠爾》。19 世紀中葉俄羅斯使團懇請理藩院重版一份藏文經文。王西里回憶，當時這兩套經文的市場價為 7,000 銀盧布(等於 3,500 銀兩)。王西里如此記錄這件事：

使團受到的答覆是，《甘珠爾》和《丹珠爾》很久沒重版，而刻板又腐爛又丟失，但中國政府對我們很慷慨，命令把一套藏於某呼圖克圖圖書館的版本送給我們。²²

這份贈品有關的細節保存在圖卡列諾夫向外交部亞洲司的報告中：

使團第一次向中國政府發查詢後，三個月沒受到答覆。但政府並沒忽視這件事，北京各喇嘛教寺院收藏的版本被調查出來，然後找到合適的一套，命令北京呼圖克圖將收藏經文的那棟樓鎖住。獲悉這套經文的狀態良好後，政府給主人付二百銀兩(就是官庫賣價)，把整套買下來。1844 年五月中午我(指圖卡列諾夫)突然受到消息，要安出來迎接這套書經，後來進來一位警官、幾位喇

19 李逸津，〈俄藏中國古籍的「藏寶圖」：評葉可嘉、馬懿德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國書籍目錄》(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2012)〉，《孔子學院》(俄羅斯版)，2012.6: 56。

20 同上，頁 57。

21 Хохлов А. Н.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 стр. 47.

22 同上，頁 248。

嘛，經文用黃布包起來，上面蓋圖克圖印，共占五輛大車。經卷數完後，警官宣布，理藩院獲得皇帝批准後，將這套贈送給我們，是狀態良好的赤字版。²³

經歷很多艱難後，《甘珠爾》和《丹珠爾》到達聖彼得堡，而藏在亞洲博物館。俄羅斯印度專家歐登堡教授（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1853-1934）1897年編著名 Bibliotheca Buddhica 叢書時，就使用到這套書經。²⁴

王西里的青年同仁戈爾斯基（Горский В. В., 1819-1847）1847年在北京病逝後，其收藏的一批佛教書籍被賣給王西里；另外，他還運用了戈爾斯基所留下的學術筆記。基於這些資料，他在1847-1848年間撰寫了兩冊的佛教術語詞典，主要依靠列入《甘珠爾》的一部梵藏詞匯集 Mah vyutpatti 的抄本（Mah vyutpatti 詞匯典共 9565 個佛教詞匯）。王西里用的手寫本原來屬於某清朝官員，而本書的價值在於其頁面上增寫了中文和蒙文的譯文。這本手寫本的發現令王西里很興奮，但他意識到中蒙文的譯文不可靠，王氏參考了蒙文的《丹珠爾》，但無法完成中文部分的對照。

王西里在北京完成了巨作《佛教的信解，歷史和文獻》（Буддизм. Его догматы, истор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的幾冊手稿，按著者的原來計劃本巨作要包含如下的部分：《佛教信解在 Mah vyutpatti 術語詞典的闡明》（Буддистские догматы, изложенные в объяснении на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ахавьютпатти, 未發表），《佛教文獻概況》（Обозрение будд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未發表），《印度佛教史：多羅那他的藏文著作的譯文》（История буддизма в Индии, перевод с тибетского сочинения Даранаты, 1869年發表），《西藏佛教史》（Sumbha 蘇姆婆（？）呼圖克圖《西藏佛教史》的譯文，未發表），《玄奘的西域記》（譯自漢語，未發

表）。1854年訪聖彼得堡時，他給科學院提供了一篇〈佛教相關文獻的概況：小乘、大乘瑜伽派、中觀宗、戒律〉（Обозрение книг,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до буддизма по школам: Хинаяна, Иогачара, Мадьямика, Виная, Бавья）和《佛教術語詞匯》的手稿。遺憾的是，術語詞匯沒發表，因科學院缺乏適當的技術資源。²⁵

1857年王氏的著作《佛教信解、歷史和文獻。第一部：概況》（Буддизм. Его догматы, истор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Общее обозрение）獲得俄羅斯科學院的贊助，而在聖彼得堡問世，是他所編寫的佛教研究著作的一小部分。很遺憾，他最有價值的著作都沒發表，其中一部分甚至丟失。王西里在《佛教信解、歷史和文獻》序言表示，據他所知，西方和俄羅斯還沒人出版完整又清晰的介紹佛教的著作。因此，他的任務是首先給讀者介紹佛教，而這種闡述方式不需要加很多註解，然後才可以出版佛教著作譯文和註解。王西里強調自己研究的獨立性，他全部依靠佛教文獻和原作的研究，而很少提到別人的著作。²⁶ 王氏承認，他的文章還需要不少改正和潤飾，但他擔心研究成果過時得很快。王西里從旁觀者的角度觀看佛教文獻，他想追蹤佛教的發展。王西里是佛教文獻高手，看完無數資料後，他的總結是，寫出完整的佛教史是難度特高的任務，因每個流派突出自己的看法，而忽視或隱瞞其他流派的歷史和信解。因此，他選西藏高僧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1608）作為基礎，對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的譯文和研究稱為《佛教信解、歷史和文獻。第三部：印度佛教史。多羅那他的著作》（Буддизм. Его догматы, истор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третья. История буддизма в Индии. Сочинение Дхаранаты. СПб）1869年發表。王西里認為，中文的佛經比原文（梵文）保存的多，是指小乘佛教經、戒律、阿毘達磨，但講佛

23 同註 21，頁 248-249。

24 同註 21，頁 248。

25 同註 21，頁 62。

26 如西方佛教權威的著作：Burnouf E.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I partie. Paris, 1844（比爾努夫，《印度佛教史導論》，巴黎，1844），比爾努夫的研究只應用梵文文獻，而王西里全部依靠遠東國家的文獻，他認為中文譯文更真確的反映最早期梵文經文的內容。

教史的藏文資料比中文的多。²⁷

王西里在聖彼得堡大學的一系列公開演講（1871）收錄入《東方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一書（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пб., 1873, 共 183 頁），另刊於《國民教育部期刊》（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73 年 4 月, 頁 239-310；文章第二部：1873 年 5 月, 頁 29-107；第三部：1873 年 7 月, 頁 260-293）。2012 年莫斯科的《URSS ЛИБРОКОМ》出版社重版王西里的這篇著作（Васильев В. 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Москва: URSS ЛИБРОКОМ, 2012）證明王氏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沒失去迫切性。針對學生和教師的演講不是直接切入到主題，而先論述對各國宗教的了解如何能提高教育水平。宗教不僅是每個民族思想和精神的精粹，對其充分認識也助於俄羅斯政府的啟蒙使命。王氏指出，俄羅斯的命運就是往東的擴大，因而俄國人必須充分了解東方國家和社會。他寫到：

我們已有那麼多亞洲民族——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滿族人、芬蘭人，我們國家有很多異國宗教如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薩滿教。我們占居伊寧（俄國人稱之「固爾劄」Кульджа, 1868 年）後，我國國民中還出現了儒教和道教信徒。難道這個情況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假如我們更多了解我國國民的宗教，就能夠避免很多已經遭遇的困難。

王西里指的是那些困難？喇嘛教在布里亞特人中的迅速普及是其中一個問題，著者認為，當地俄羅斯官員太少了解喇嘛教和這塊土地的國情，因而給喇嘛教的普及提供良好的條件，甚至比喇嘛教的發源地好，高層喇嘛們所掌握的權力很大。由於和尚人數不斷增加，喇嘛教給本民帶來重大的負擔。另外一個令王西里擔憂的現象是伊斯蘭教的迅速往東的擴大。因而，王氏把東方宗

教研究連接到俄羅斯帝國的內部問題。

〈東方宗教〉一文首先關注四書五經出現的時期。王氏介紹作為中國社會主流的儒家思想時，先反駁中國是東方專制的說法，他認為儒家思想有效地遏止專制，而中國皇帝（王氏稱之 богдыхан, 「神聖的汗」的意思）比他最低的人臣受到更大的束縛。中國的官同時也是學人，王氏在死板的儒家觀念看到中國社會的劣根性。在中國，大臣或皇室貴族如果犯罪很難避免懲罰，而在歐洲這種事情一般被壓下。因此，王氏還是承認儒家思想的一些正面性。

該文對佛教的介紹主要集中在印度佛教的形成和往外普及，是所謂「無文字」的階段。他確信，西藏佛教的形成受到中亞景教的影響，因而佛教的誕生與來自古代西方的影響有關。但是，佛教與他教的主要差別在前者的最終目標，既是任何活物都能變成神（佛），對俄國人而言，這是一種褻瀆理念，是獨立於西方一神論所產生的信念。由此可見，王氏用東正教為宗教標準來比較佛教與東正教比較。佛教中有一套實踐的做法，如靜觀或冥思（俄文稱之為 созерцание）。王氏強調，佛教最終發展到「魔法宗教」（指密宗的怛特羅），他引用宗喀巴（Tsong-kha-pa, 1357-1419）的著作來概括密宗，很詳細地介紹密宗的修行方法。

說到道教時，王西里指出，道教的觀念與儒教對立，而所有「非八股文」的寫作可歸給道教，包括在民間流傳的神奇小說等。王西里認為，道教充滿迷信，也受到佛教的很大影響（如打坐、受戒、宇宙論等理念）。俄羅斯道教研究權威陀爾奇諾夫教授（Торчинов Е. А., 1956-2003）於 1991 年寫到，除了王氏對文獻有令人敬佩的掌握能力外，他不僅了解早期（老莊）道教，而且很詳細地介紹晚期（漢後）宗教道教。²⁸ 他對晚期道教宇宙論的研究迄今仍是唯一的。作為佛學專家，王西里最多關注的是佛教對於宗教道教典範的影響。陀爾奇諾夫認為，王氏對道教使用性文獻（煉丹、魔術）和

27 Илларионов, В. Т. Русский синолог 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гг. Горький, 1959, с.14（伊拉李歐諾夫，《俄羅斯漢學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高爾基市：1959，頁 14）。

28 Торчинов Е. А. Труды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даосизма // 22-я НКОГК. Ч. 3. М.: Н

民間道教文獻有一種輕視。無論如何，對道教呼吸、導引等成仙或內丹技巧的詳細介紹，顯示這位俄羅斯漢學家在這個領域占有領先的位置。王西里指出，道教的內部變化是在與儒釋對立過程中所產生的。

宗教有關的著作顯示王西里很重視系統性和明確性，是西方科學的態度。他所研究的中國宗教文獻經常無法滿足他對邏輯性的渴望，因而給大眾讀者寫一篇介紹性文章比純粹學術文章還困難。王西里寫作風格的主要特點是：他喜歡直接表示自己的看法和評價，而很少用引言和註解。他經常批評中國書很缺乏這種主觀立場和評價。但王氏的〈東方宗教〉遇到同仁的批評，如王氏的學生米拿耶夫（Минаев И. П. 1840-1890）認為他老師的這篇著作充滿「西方高於東方」，「科學從西方來到印度」等偏見。²⁹

除了以上的著作，王氏還發表了《佛教在西藏》³⁰（1864），《佛教筆記》³¹一系列文章（1887-1890，1899再版），《按戒律分期佛教的發展》³²（1895）等。

除了以上提到的，他未發表的佛教有關著作還有：1. 含譯文和簡介的《中國三藏書目》（Каталог китайской трипитаки с переводом и кратким анализом），是智旭《閱藏知津》（1654）的譯文；2.《佛教文字概論》（Обозрение буд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1842），3.《佛教信解的短篇》（Этюды по буддистской

догматике）³³；4.《翻譯名義集》的目錄（Оглавление к буддистскому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лексикону «Фань и мин и цзи», 4 с.）；5.宗喀巴傳（用藏蒙文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Цзонкавы, по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и тибет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40 с.）；6.取自 Vasumitra 文集關於十八教派的論述。譯自藏文（О 18 сектах. Из собрания Васумитры (?). Пер. с тиб. яз. 12 с.）；7.解釋佛教信解的藏蒙文文獻概括（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бзора буддистской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тиб. и монг. источникам, 20 тетр.）；8.貝加爾湖後區的喇嘛（3 абайкальское ламство）；9.喇嘛教神職人員（Ламайск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關於西藏日曆》等文章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фонд 775）。

五、漢語研究和字典編寫工作

作為 19 世紀啟蒙時代的學者，瓦西里耶夫的學術研究範圍很廣泛。漢語也成為他研究的一部分。他的兩部著作呈現學者對於漢字結構的理解，即是《中國漢字分析》（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1884，再版 1898）³⁴和《漢字筆畫系統：首部漢俄詞典試編》（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аука, 1991. С. 23（陀爾奇諾夫，〈瓦西里耶夫和道教研究的迫切性問題〉，載《第 22 屆中國國家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1991，第 3 冊，頁 23）。

29 Минаев И. П.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74, март, 127-148（米拿耶夫，王西里《東方宗教》的書評，《國民教育部期刊》，1874 年 3 月，頁 127-148）。

30 Буддизм в Тибете.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газета», 1864, № 9.

31 Заметки по буддизму. 1)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имя царя Аджаташатру阿闍世王 (Aj ta atru) 的現代名字; 2) Новая эра смерти Будды佛教死亡後的新西元. «Запис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 55, кн. 2, Спб., 1887, с. 122-124, с. 124-131; Заметки по буддизму. 3) Бикшу на угощение作為酒食的比丘; 4) Угощение бикшу (II) 給比丘的酒食 (二). «Запис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 59, кн. 2, 1889, Спб., с. 49-70; Заметки по буддизму. 5) Буддистский пересказ о женской хитрости女性狡猾故事的佛教再講. «Запис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 62, Спб., 1890, с. 25-37. 再版: Заметки по буддизму.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V серия, 1899, № V, 10, с. 337-354, № VI, с. 393-402.

32 Буддизм в пол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по винаям. «Восточные заметки». Сб. статей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офессоров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факт. вост. яз. СПб. Императ. Ун-та. Спб., 1895, с. 1-7.

33 後來他的學生伊瓦諾夫斯基 (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О., 1863-1903) 把這些資料重寫和整理。

34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В 2 ч. Спб., изд. 1, 1884, изд. 2, 1898.

Опыт первого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1867), 後者於 2010 年在聖彼得堡大學影印出版。³⁵ 王西里的這部詞典的創新在於, 他「歸納分類系統原則是從外形上通過字的右下角確定字素, 再根據這些字素與漢字基本筆畫的關係, 使書寫符號類聚成詞典條目, 而詞典條目的內部構造也是基於這種組構原則」。如此, 王西里列出來十九種畫作為不同字素的標誌。他提出的排字系統「使學漢語的方法更接近學歐洲語言的方法, 而特別接近俄羅斯文化, 這是一種有效並成功的試驗……王西里法名方法的知名度不高, 但它作為在俄羅斯受到普及四角號碼的基礎。」³⁶ 王西里的目的是把漢字的筆畫和發音在排字的程序中連接起來, 如伊利亞·奧沙寧(鄂山蔭 Ошанин И. М., 1900-1982) 主編有二十萬詞彙的四卷本《科學院版漢俄大辭典》(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в 4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1983-1984) 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王西里的排字方式。蘇聯漢語語言學家謝梅納斯女士(Семенов А. Л. 1937-2007) 指出, 王氏的排字體系不僅助於學漢語, 且不缺科學基礎, 這個體系呈現了漢語文字結構的規律。³⁷

談論漢語時, 王西里想反駁當時西方漢學界極普遍存在的「漢語沒有語法」的信念。王西里對比較語言學也作出貢獻, 在〈論漢語與中亞語言的關係〉³⁸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м) 一文中, 他對滿、蒙、韃靼和漢語作比較, 發現這幾門語言如何互相補充。他的論點反駁西方學人將漢語定為「封閉語言」

的說法。總之, 王西里對漢語的主要論點如下: 1. 漢語的詞庫龐大; 2. 漢語有詞法; 3. 發音、詞法和文字密切相關; 4. 漢語有語法。

六、世界首部《中國文學綱要》

2013 年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再版王西里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學史綱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³⁹ 原版 1880 年問世, 是《世界文學通史叢書》的一本(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Ф. Корш, К. Л. Риккер ред., СПб., 1880, стр. 450, 1885 年再版)。新版的價值在於, 除了俄文原文外, 還加上了俄羅斯漢學史權威南開大學教授閻國棟做的中文譯文, 方便中俄學者應用這本書。該書封面上為何寫著「世界首部中國文學史專論」? 1851 年王西里在喀山大學開始教「中國文學史」的課程, 自 1855 年他在聖彼得堡大學負責這個課程, 是整個歐洲大學裏最早開發的中國文學史的課程, 而《中國文學史綱要》是那個課程的綱要。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 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要再過四十年, 即 1901 年才問世。

本書名中的「文學」並不是現代(或西方)意義上的文學, 而是「資料」或「文獻」的意思。現代讀者所習慣的「虛構文學」(fiction) 在王氏著作裏占很小的部分, 後面兩章才探討「雅文學」(изыщная словестность), (詩賦) 和「民間文學」(народ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35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Опыт первого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СПб., 1867, литограф Тиблена и Ко., XVI + 456 стр. 可參考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網頁上的在線版: <http://www.ci.spbu.ru/slovar/index.html>。

36 索嘉偉(Сторожук А. Г.) 對本部詞典再版的書評, 載《孔子學院(俄羅斯版)》2011 年第 4 期(總 7 號), 頁 28。

37 Семенов А. Л. Значение трудов Васильева В. П.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 22-я НКОГК. Ч. 3. М.: Наука, 1991. с. 95, 102. (謝梅納斯, 〈王西里中國語文學著作的重要性〉, 《第 22 屆中國國家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 1991, 第 3 冊, 頁 95、102)。

38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м,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72 г., сентябрь. 《國民教育部期刊》, 1872 年 9 月。

39 王西里著, 羅季奧諾夫責任編輯, 閻國棟翻譯, 《中國文學史綱要(俄漢雙語版)》(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 2013)。可參考在線版: <http://www.ci.spbu.ru/book/Vasilev-ocherki/Vasilev-ocherki/index.html>。

（戲曲、中長篇小說）。王西里正確地提出：

中國人所理解的雅文學與我們的理解完全不同。在中國人看來，任何一小篇議論、訓示、劄記、諭旨、表疏、賀詞、詔誥、書信、序文、墓誌、悼文、祭文，都是散文體的雅文。這種文學（除了後來出現的八股文）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漢代。⁴⁰

在歐洲受尊重的小說和戲曲在中國被蔑視。但王西里確信，不是迂腐的儒家經典，而是小說和劇本，能為外人掀開中國神祕的面紗。

他認為，把中國各流派的思想整理起來是很困難的，因「這些認識只有付出艱苦的努力才能從東方研究者面臨的雜亂紛繁的信息中獲得。」⁴¹王氏指的是雅典和古羅馬文獻研究的悠久歷史，而東方文獻研究離這個標準還遠。在相關西方著作中王西里只承認理雅各所譯《中國經典》⁴²的參考價值。

本著作的前幾章主要探討最早儒家經典年代問題，王氏認為這些經典並沒中國人相信的那麼古老。孔子年代用的文字後來被秦始皇年代的文字所代替。王氏將儒教分成兩段：第一段是漢前的儒家思想，第二段是漢後，他對第一段的總結：我們認為構成儒學早期發展基礎的只有《春秋》和《詩經》，而後增列了《論語》、《禮記》和《書經》（最早的 29 篇本），最後又加上了《孟子》。這些書可以被稱為純粹的儒學論著，可後來《易經》也位列其中。自此，儒學這種純粹的世俗學說便被摻雜進了極端抽象的哲理色彩。而且，這種哲理思考最終演變

成了萬物有靈論。⁴³王氏分析這些典籍的語言，認為越早的文字越晦澀難懂，因古人的文字還不夠發達，沒辦法表達清楚很多種抽象理念和想法。瓦西里耶夫一貫強調《詩經》作為文獻的文學和歷史價值，但被儒家所歪曲。

在第八、九章介紹道教和佛教時，王西里指出，「道教也是在從佛教那裏學了方法之後才獲得了宗教的形態」。王西里如此解釋佛教在中國能扎根的原因：《妙法蓮華經》講的是愛、我佛慈悲、上天的關懷以及對每次熱誠祈禱的回應，而這正是中國所缺乏的東西。⁴⁴王西里也強調中國佛教文獻是唯一研究早期印度佛教的資源。

王氏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和其他著作充滿懷疑精神，而這種精神呈現出如下的看法：1. 他懷疑中印歷史的悠久；2. 兩者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才產生；3. 不認同《論語》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他將中國描述為「人口大，人勤勞，又有才能的國家」，但完全滲入到「經典的廢話中」；4. 看不到東方社會推動發展的因素，認為是停滯的社會；5. 懷疑中國古代經典的真實性。他比佛教文獻更懷疑儒家經典，但這種懷疑精神允許他把漢學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他能克服西方漢學家的一個弱點，就是對中國文獻的過度信任。⁴⁵

王西里經常承認他無法專心地去研究一個主題，因當時的漢學空白太多，而王氏成為很多領域的開闢者。除了突破性的研究外，他也是中國等遠東國家有關教學的偉大組織者。

40 同註 39，頁 309（從此處起，引言是閻國棟的譯文）。

41 同註 39，頁 11。

42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In seven volu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95; *The Chinese Classics. Part I, Confucius. A Translation by James Legge*. New York: John W. Lovell Company, 1870.

43 王西里著，羅季奧諾夫責任編輯，閻國棟翻譯，《中國文學史綱要》，頁 217。

44 同上註，頁 245-249。

45 Илларионов, В. Т. Русский синолог 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гг. Горький, 1959, с.25-26.